

二程语录

语法研究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黄锦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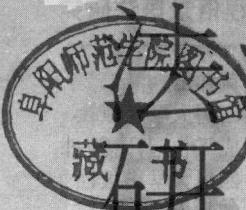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黄锦君◎著

二程语录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静
责任校对:张振刚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程语录语法研究 / 黄锦君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6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ISBN 7-5614-3096-5

I . 二... II . 黄... III . ①程颢 (1032~1085) -
语录 - 语法 - 研究 ②程颐 (1033~1107) - 语录 - 语法
- 研究 IV . 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4711 号

书名 二程语录语法研究

作 者 黄锦君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 mm×202 mm
印 张 8.75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801~4 8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 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 www.scupress.com.cn

目 录

引 言	(1)
1. 二程及二程语录	(1)
2. 二程语录与近代汉语	(8)
一、称代篇上	(14)
1. 第一人称代词	(15)
1.1 我	(15)
1.2 吾	(17)
1.3 余	(19)
1.4 予	(19)
1.5 朕、臣	(20)
1.6 某	(20)
2. 第二人称代词	(26)
2.1 你、汝(女)、尔	(26)
2.2 贤	(28)
3. 第三人称代词——他(佗)、彼	(33)
4. 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	(42)
二、称代篇中	(47)
1. 这	(49)

2. 那	(55)
三、称代篇下	(58)
1. 谁(孰)	(59)
2. 何	(60)
3. 安(恶、焉)	(65)
4. 那	(67)
5. 甚	(68)
6. 怎生,怎	(74)
四、助词篇上	(78)
1. 了	(78)
2. 却	(91)
3. 著	(95)
4. 过	(99)
5. 将	(100)
6. 取	(102)
五、助词篇中	(104)
1. 底	(105)
2. 地	(109)
3. 的	(111)
4. 个	(112)
六、助词篇下	(117)
1. 也	(117)
2. 矣	(127)
3. 焉、已、耳、尔、乎、哉、邪(耶)	(129)
4. 里、在、著、无	(135)
七、造句篇	(140)
1. “得”字结构	(140)
2. 处置式	(155)

3. 被动句	(160)
八、二程语录与《祖堂集》语法比较	(174)
1. 人称代词	(175)
2. 动态助词	(177)
3. 结构助词	(181)
4. 语气词	(182)
5. “得”字结构	(184)
6. 处置式	(187)
7. 被字句	(188)
结 语	(191)
附：二程语录词语例释	(194)
词语引论	(194)
词语例释	(202)
参考文献	(262)
后 记	(269)

引言

1. 二程及二程语录

二程指北宋程颢、程颐兄弟。

程颢（1032—1085），字伯淳，宋洛阳（今属河南）人，进士。宋神宗熙宁初，因吕公著之荐，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王安石议行新法，上章论其不可，被罢。哲宗继位，命为宗正丞，未即任，卒，时元丰八年，年仅五十四岁。颢“资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益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见其忿厉之容”，人称明道先生。^①

程颐（1033—1107），字正叔，颢弟，早有名望。哲宗即位之初，因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举荐，被召入京，任崇政殿说书，士人之投其门下者甚众。元祐五年，父亲去世，去官。绍圣四年编管涪州。徽宗即位，还归故里。不久复官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建中靖国二年，落职。后屡因党祸牵连，至闭门不接

^① 《宋史·道学传一》、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一）。

生徒。大观元年，七十五岁，卒。人称伊川先生。^①

两宋学术兴盛，派别众多。仅以理学而言，有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等。北宋时期，洛学的影响较大；南宋以后，朱熹一派影响最大。虽然朱熹之学曾由于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被视为“伪学”而遭禁绝，但却被后来的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颇具影响的哲学思想。

理学在北宋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由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逐渐突出，世家豪族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异常激烈，农民受到的盘剥更加残酷，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不灵，边界战火不断，民族矛盾尖锐，等等。内忧外患，统治者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新的举措来巩固封建制度，加强中央集权。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虽然自汉以来经董仲舒提倡，受到统治者的特殊重视，但由于儒学本身的粗疏和缺陷，其地位不断受到各门、各派的威胁。特别是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儒家学说受到了严重冲击。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为特点的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社会不变的纲纪。在经历了晚唐五代的分崩离析之后，建立秩序、重振纪纲便成了一种非常迫切的需要，一种政治和社会的需要。

理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虽然理学的内涵已大大超出了传统儒学的范畴，但在基本出发点上，特别是在封建的道德观、伦理观上，二者之间仍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最突出的一点是在政治上倾向于保守。程颢曾与王安石同朝共事，当王安石变法之时，程颢曾将之比为“大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

^① 《宋史·道学传一》、朱熹《伊川先生年谱》（《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附录》）。

上，38)^①，并且认为“极有害”（《遗书》卷二下，50）。在北宋党争中，二程属于保守的司马光、吕公著一派，他们都极力维护现有的政治体制和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尽管二程的政治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南宋朱熹的境遇也类似），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思想学说的传播。

程朱理学代表着当时以及后来的封建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水平，同时它又是最适宜解释封建统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因此受到了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朝统治者的极力追捧。理学在两宋的崛起以及对后代的影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统治者的需要，也是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理学家们虽然以儒为本，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孔孟旧有的思想学说，他们大都曾经接受过黄老和佛教的熏陶和影响。程颢、程颐兄弟早年受学于周敦颐，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云：“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程颢的经历也是大多数理学家的经历，在出入释老之后，他们最后在儒家的学说那里找到了他们认为最根本的东西，于是，“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一）。

在二程学说中，“理”或“天理”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并贯穿于学说的始终。程颢曾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外书》卷一二，424）二程规定“理”或“天理”属第一性，它是物质世界的总根源。有“理”，才有物、有事、有用，“理”成了解释世界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理”或“天理”是二程哲学逻辑结构的最高范畴，“理”在二程哲学中具有

^① 《河南程氏遗书》，以下简称《遗书》；《河南程氏外书》，以下简称《外书》。

多方面的含义，“天者，理也。”（《遗书》卷一一，132）“理便是天道也。”（《遗书》卷二二上，290）“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遗书》卷二二上，292）……“若实穷得理，即性命亦可了。”（《遗书》卷二上，15）总之，理是对自然规律和社会伦理道德的总结和概括，是万物的“必然”和“所以然”。二程之所以被视为“理学”的奠基者，就在于他们从“理”的角度探索了自然与社会的本体问题，从不同的方面对“理”的范畴展开了多层次的论证，确定了“理”在理学中的地位，不但为理学家追求自然、社会、人生的真谛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新的方法和理论。

陈寅恪先生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 邓广铭先生也说：“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② 作为两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二程及其学说值得我们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从现存的程颢、程颐的著述来看，主要有《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河南程氏文集》、《周易程氏传》、《河南程氏经说》、《河南程氏粹言》几个部分，二人的作品按体裁分类收录。《文集》收录的内容包括二程的表疏、书启、杂记、诗歌、家传、行状、墓志、祭文等，卷一至卷四为程颢所作，卷五至卷十二为程颐所作；《易传》四卷是程颐对《易经》的注释；《经说》是对《易》、《书》、《诗》、《春秋》、《礼记》、《论语》、《孟子》、《中庸》等的解说，除卷五有一部分为程颢所作外，其余皆为程颐所作；《河南程氏遗书》及《河南程氏外书》是二人的语录集。

① 《金明馆丛稿·二编》，277页，三联书店，2001。

② 《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2）。

《河南程氏遗书》二十五卷，朱熹辑。其跋文曰：“右《程氏遗书》二十五篇，二先生门人记其所见闻答问之书也。始，诸公各自为书，先生没而其传寢广，然散出并行，无所统一，传者颇以己意私窃窜易，历时既久，殆无全篇。熹家有先人旧藏数篇，皆著当时记录主名，语意相承，首尾通贯，盖未更后人之手，故其书最为精善。后益以类访求，得凡二十五篇……”（《二程集·目录》）

从朱熹的跋文可以得知，《遗书》是参照程门弟子各自的记载而整理成篇的。二程一生讲学多年，据《宋元学案·明道学案》及《宋元学案·伊川学案》记载，程门弟子有刘绚、李吁、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中、吕大钧、吕大临、尹焞、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郭忠孝、许景衡、田述古、邵伯温、苏珦、邢恕等，其中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又称为程门“四先生”。

《遗书》卷一，李吁录。李吁字端伯，洛阳（今属河南）人，进士。元祐中为秘书省校书郎。程颐曾称“《语录》，只有李吁得其意，不拘言语，无错编者”。朱熹将之编列为首篇。

卷二，吕大临录。吕大临，字与叔，蓝田（今属陕西）人，元祐中为太学博士，著有《礼记传》。

卷三，谢良佐录。谢良佐，字显道，上蔡（今属河南）人，进士。著有《上蔡先生语录》。

卷四，游酢录。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阳（今福建建阳）人。曾任太学博士、监察御史等，著有《易说》、《诗二南义》、《中庸义》、《论语孟子杂解》等。

卷五至卷九，编录人不明。

卷十，苏珦录。苏珦，字季明，武功（今属陕西）人，始师张载，后师二程。元祐末为太常博士。

卷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刘绚录。刘绚，字质夫，常山（今属浙江）人。曾为京兆府教授、太学博士。长于《春秋》。程

颢常曰：“他人之学，敏则有矣，未易保也，若绚者，吾无疑焉。”（《宋史·道学传二》）

卷十五、十六、十七，编录人不明。

卷十八，刘安节录。刘安节，字元承，永嘉（今属浙江）人，登进士第，为监察御史。

卷十九，杨迪录。杨迪，字遵道，南剑州将乐（今福建将乐）人，杨时长子，师程颐。

卷二十，周孚先录。周孚先，字伯忱，晋陵（今江苏常州）人，与弟恭先俱从程颐学。

卷二十一，张绎录。张绎，字思叔，河南寿安（今河南宜阳）人。

卷二十二，唐棣编。唐棣，字彦思，常州宜兴（今江苏宜兴）人，登进士第，官秘书丞。

卷二十三，鲍若雨录。鲍若雨，字商霖，永嘉（今属浙江）人。

卷二十四，邹柄录。邹柄，字德久，晋陵（今江苏常州）人，从杨时游。

卷二十五，畅大隐录。畅大隐，字潜道，洛阳（今属河南）人。

《外书》十二卷，是《遗书》的补编或续编。朱熹辑。

卷一为“朱公掞录拾遗”。朱光庭，字公掞，宋偃师（今属河南）人，嘉祐进士，哲宗时为左正言，累官给事中，为洛党重要人物。

卷二为“朱公掞问学拾遗”。

卷三为“陈氏本拾遗”。陈氏指陈渊，字几叟，延平（今福建南平）人，杨时门人。

卷四为“程氏学拾遗”。李参录，参，李吁弟。

卷五为“冯氏本拾遗”。冯氏指冯理，字圣先，号东皋子，

汝州（今河南临汝）人，学于程颐。

卷六为“罗氏本拾遗”。罗氏指罗从彦，字仲素，延平（今福建南平）人，杨时门人。

卷七为“胡氏本拾遗”。胡氏指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今福建崇安）人，高宗朝累官给事中，谥文定。

卷八为“游氏本拾遗”。游氏指游酢。

卷九为“春秋录拾遗”。朱熹注云：“吴人王莘信伯，学于伊川先生，集录诸言《春秋》者为此篇。”王莘，字信伯，号震泽，福清（今属福建）人，高宗朝除秘书省正字，官至左朝奉郎，有《论语集解》等。

卷十为“大全集拾遗”。建阳印本。

卷十一为“时氏本拾遗”。朱熹注云：“时紫芝所集，号《程子微言》，凡二十五卷，多改易本语者。”时紫芝生平不详。

卷十二为“传闻杂记”。选自《王氏塵史》、《吕氏家塾记》、《邵氏闻见录》、《上蔡语录》、《龟山语录》等二十种书籍资料。

《外书》的内容比较驳杂，有的与《遗书》内容重复。朱熹《外书跋》云：“右《程氏外书》十二篇……其曰《外书》云者，特以取之之杂，或不能审其所自来，其视前书，学者尤当精择而审取之耳。”（《二程集·目录》）

另外，还有《粹言》二卷。张栻《粹言序》云，杨时将“河南夫子书，变语录而文之者也”。后来则由张栻“离为十篇，篇标以目”，重新编次而成。

二程语录一般指《河南程氏遗书》和《河南程氏外书》两种。前者二十五卷，后者十二卷，总共约二十一万字。也有人将《粹言》一并统入“语录”，由于此部分内容有重复之嫌，又是用文言写成，不包括在我们所讲的“二程语录”之内。

2. 二程语录与近代汉语

程颢、程颐生活的年代在北宋仁宗至徽宗之间，即公元1032年至1107年。在汉语史的分期上，按照王力先生的分期，属于中古汉语时期；按照吕叔湘先生的观点，则属于近代汉语时期。王力先生的分期主要着眼于语音，吕叔湘先生的分期主要着眼于语法、词汇。鉴于二程语录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我们将二程语录考虑在近代汉语这一范围之内。

关于汉语史的分期，各家说法不一。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指出：公元3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3、4世纪为过渡阶段；公元4世纪到12世纪（南宋前半期）为中古期，12、13世纪为过渡阶段；公元13世纪到19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①

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指代词·序》中认为：“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适合的。”^②蒋绍愚先生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中，鉴于“现代汉语”与“近代汉语”有“相当的不同”，主张采用“三分法”，认为“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应该鼎足而三。并指出，“近代汉语是从唐初到清初人们在口语和反映口语的书面语中使用的汉语。”^③

① 《汉语史稿》，上册，35页，中华书局，1980。

② 《近代汉语指代词·序》，学林出版社，1985。

③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那么，近代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有哪些特点呢？

举例来讲，语音方面如入声消失、浊音清化；词汇方面则出现了大量的俗语口语；语法方面如被动式、处置式的大量使用以及结构助词、动态助词的完善、规范等。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近代汉语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深入、全面的地步，因而我们对近代汉语的了解也很有限。

从整个汉语史的发展来看，近代汉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这不仅因为它承上启下，而且因为在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之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其中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战争征服等等，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汉语发展迅速，变化纷繁。

长期以来，近代汉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仅传统语言文字的研究很少聚焦晚唐五代以来的口语文献，现代语言学家们对它的关注也是近几十年的事，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近代汉语的研究才有了较大的发展。

近代汉语的研究起步较晚，从语法的方面来看，20 世纪 40 年代，吕叔湘先生发表的有关近代汉语语法的论文，如《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等，才开了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河。这些论文被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誉为“真正是开辟了前人未曾研究过的领域，宣告了近代汉语研究的黎明”。（《中国语历史文法·汉译本序》）五十年代以后，国外学者也涉足了近代汉语这一领域，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建树颇丰，如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实际上就是一本颇为详细的近代汉语语法；志村良志的《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也对近代语法做了一系列论述。七八十年代，美国的梅祖麟、法国的贝罗贝也写了有关近代汉语的一系列文章。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论文著述开始多了起来。代词研究方面，如吕叔湘著、江蓝生补的《近代汉语指

代词》(1985)，该书第一次较全面地对近代汉语的指代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了近代汉语代词的来源、用法、发展变化等。助词研究方面，如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的《近代汉语虚词研究》(1992)，曹广顺的《近代汉语助词》(1995)，孙锡信的《近代汉语语气词》(1999)等，都对近代汉语助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句法方面的研究虽然专书都曾论及，但相对而言，专题论文的研究显得更为深入一些，如岳俊发《得字句的产生和演变》(1984)、袁宾《祖堂集被动句研究》(1989)、杨平《动词+得+宾语结构的产生和发展》(1989)、唐钰明《唐至清的被动句》(1988)、贝罗贝《早期把字句的几个问题》(1989)、梅祖麟《唐宋处置式的来源》(1990)等。

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收录了《乙卯入国奏请》、《河南程氏遗书》、《碧岩录》、《三朝北盟会编》、《大慧普觉禅师书》、《王俊首岳侯状》、《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朱子语类》、《刘知远诸宫调》、《虚堂和尚语录》等不同体裁的文献资料，涉及史料、笔记、小说、语录、曲艺诗词等诸多范围。从这个选目我们可以发现，近代汉语的深入研究需要我们去发掘不同体裁的、传统语言研究所忽略的各种语料，因为恰恰是在这些语料当中，保存了大量的反映近代汉语面貌的重要信息。

虽然近代汉语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近代汉语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打开局面。从宋儒语录的研究来看，各家的专书论文早已频频有所涉及，但大多局限于例证方面的引用，全面的穷尽性的工作还开展得较少。南宋的朱熹因为在历史上影响较大，所以对朱熹的研究较多，专书如祝敏彻的《朱子语类句法研究》，有关《朱子语类》的语法方面的论文也还不少。相对而言，对二程语录的研究就非常有限了。

在宋儒语录中，影响最大的是《朱子语类》，其次便是二程

语录。

从总体来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二程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 17 年间，发表的有关二程的论文仅两篇，其中一篇是批判性的。“文革”期间的文章稍多，也都是批判性的。自 1980 年冯友兰发表名为《程颢程颐》的论文起，二程作为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开始引起了当代人们的关注，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现了一些。研究内容涉及二程思想，以及二程的生平、著作、影响、地位，还有学术渊源、社会文化思潮、与其他学术流派的关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主要集中在哲学和思想史方面，有关语言方面的研究很少。

语录本来是一种文体，是某人或多人言论的记录或摘录。从广义的范围来看，《论语》、《孟子》等都可看作语录。而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语录”条云：“释之语录始于唐”，“达摩西来，自称教外别传，直指人心，数传以后，其徒日众，而语录兴焉，支离鄙俚之言，奉为鸿宝”。这里的语录指禅门语录，据钱大昕的观点，禅门语录始于唐代。盖禅门不太重视对经义本身意义的解释和理解，而重视“悟”，重视对学人的随机接引，在禅师和学人之间似乎不经意的对话之中，包含了无尽的机锋和宏旨。禅门把这些对话记载下来，成为禅宗语录，以便人们进行参悟和研究。

入宋以后，儒者纷纷受到禅门释子的影响，“语录”于是大行于世。据《宋史·艺文志四》著录，宋儒如程颐、刘安世、谢良佐、张九成、尹焞、朱熹等人，都有“语录”行世。我们今天除能看到二程的语录以外，还有张载的《张子语录》、谢良佐的《上蔡语录》、杨时《龟山语录》、朱熹的《朱子语类》等。

在语言史的研究当中，最主要的是资料的选择，因为资料的选择直接关系到研究的结果和价值。太田辰夫在《中国语历史文法·跋》中，把文献分为两种，一种是“同时资料”，一种是“后